

• 托娅 彩娜 编著

内蒙古当代文学概观

内蒙古大学出版社

内蒙古当代文学概观

托娅
彩 娜 编著

(本书得到内蒙古大学出版基金的资助)

内蒙古大学出版社

1997·呼和浩特

内蒙古当代文学概观

作 者：托娅 彩娜

责任编辑：李继东

出版发行：内蒙古大学出版社

(呼和浩特市大学西路 235 号 邮政编码：010021)

经 销：内蒙古自治区新华书店

印 刷：内蒙古教育印刷厂

850×1168/32 印张：15.75 字数：390 千

1997 年 6 月第 1 版 1997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1000 册

ISBN 7-81015-775-2/I·84

定 价：25.00 元

内蒙古大学出版基金委员会

主任： 旭日干

副主任： 梁希侠（常务） 呼格吉勒图

委员： 旭日干 梁希侠 呼格吉勒图

曹之江 包祥 王璋

刘成 刘树堂 陈羽云

目 录

导 言 (1)

第一章	诗歌创作	(32)
概 述 (32)			
第一节	纳·赛音朝克图的诗歌	(48)
第二节	巴·布林贝赫的诗歌	(57)
第三节	安谧的诗歌	(64)
第四节	其木德道尔吉的诗歌	(70)
第五节	贾漫的诗歌	(77)
第六节	巴·敖斯尔 纳·赛西雅拉图 哈·丹碧扎拉森的诗歌	(85)
第七节	戈非 周雨明 纪征民的诗歌	(95)

第八节	王磊 毕力格太 勒·敖斯尔的诗歌	(106)
第九节	张之涛 查干 火华的诗歌	(117)
第十节	敖力玛苏荣 齐·莫尔根 阿尔泰的诗歌	(129)
第十一节	灿烂的星座	(139)

第二章 小说创作(上) (145)

概 述	(145)
第一节	玛拉沁夫的小说	(153)
第二节	敖德斯尔的小说	(164)
第三节	扎拉嘎胡的小说	(172)
第四节	杨啸的小说	(181)
第五节	朋斯克 葛日乐朝克图 乌兰巴干的小说	(192)
第六节	杨平 肖平 沙痕的小说	(204)
第七节	贺政民 张志彤 冯国仁的小说	(217)
第八节	张长弓 王栋 照日格巴图的小说	(229)

第三章 小说创作(下) (241)

概 述	(241)
第一节	冯苓植的小说	(250)
第二节	汪渐成 温小钰的小说	(258)
第三节	乌热尔图 白雪林的小说	(267)
第四节	哈斯乌拉 力格登 莫·阿斯尔的小说	(279)
第五节	佳峻 乌雅泰 丁茂的小说	(292)
第六节	齐·敖特根其木格 王岚 黄薇的小说	(307)
第七节	伊德尔夫 甫澜涛 江浩的小说	(319)

第八节	肖亦农 邓九刚 路远的小说	(331)
第九节	崛起的青年作家群	(344)
第四章	散文、报告文学创作	(354)
概 述		(354)
第一节	许淇的散文	(370)
第二节	安柯钦夫的散文	(379)
第三节	张永昌 王平的散文	(386)
第四节	周彦文 尚贵荣的散文	(395)
第五节	桑·舍力布 苏尔塔拉图 高文修的散文	(404)
第六节	张湘霖 策·阿拉达尔图的报告文学	(416)
第五章	戏剧、电影文学创作	(425)
概 述		(425)
第一节	超克图纳仁的话剧	(439)
第二节	云照光的电影文学	(445)
第三节	薛焰的戏剧	(451)
第四节	特·达木林的《雪中之花》和赵纪鑫的《草原小姐妹》	
		(458)
附 录		(466)
后 记		(495)

导 言

1947年内蒙古自治区成立，标志着内蒙古历史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特别是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诞生，使内蒙古步入了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时代。从此，历史的巨手，掀开了文学的新篇章——内蒙古自治区文学的历史阶段。人们习惯上把自治区这个历史阶段的文学称之为“内蒙古当代文学”或“内蒙古自治区文学”（简称“内蒙古文学”）。

至今内蒙古文学已走过了50年的历程。

半个世纪以来，内蒙古文学作为新中国文学的一部分，与祖国的前途命运紧密相联，与自治区的经济、政治共同发展繁荣。其间，虽历经艰辛与曲折，但它总是沿着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方向，不断地进行着积极的自我调节，开辟着自己的前进道路。从总体发展趋势上看，内蒙古文学经历了一个从单一狭窄到丰富多样的过程，呈现出独特的历史风貌。

内蒙古自治区，是根据党的民族区域自治政策于1947年5月1日正式成立的、是我国最早的一个民族区域自治地方。它幅员辽阔，占据祖国版图的1/9，面积达118万平方公里，是以蒙古族为自治民族，包括汉、满、回、朝鲜、达斡尔、鄂温克、鄂伦春等民族

在内的多民族的自治区。与自治区各项事业共同发展繁荣的内蒙古文学，即是由自治区内蒙古族和其它各民族文学工作者的心血共同浇灌的我国社会主义文学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应当说明的是：“内蒙古文学”与“蒙古族文学”是关系十分密切却又不容混淆的两个概念。“内蒙古文学”，指的是自治区成立以来的内蒙古境内的各民族文学，其中以蒙古族文学为主，包括汉族和其它少数民族的文学。“蒙古族文学”是指整个蒙古民族的文学，其中虽以内蒙古地区的“蒙古民族文学”为主，但也包括其它省、市、自治区的蒙古民族文学。简言之，“内蒙古文学是地域性文学，蒙古族文学则是该民族的文学。”^① 作为祖国社会主义新文学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的内蒙古文学，它和全国的文学共节拍，有着共同的发展方向，共同的性质，面临着共同的时代大环境，肩负着共同的历史使命，并以它鲜明的民族特色和地域特色丰富了我国社会主义文学宝库，为社会主义多民族文学的共同发展提供了有益的经验。

内蒙古文学的发展过程，按国内重大的政治、社会变革和内蒙古自治区文学发展的实际情况，可分为三个时期：1947年至1966年为第一个时期，这是内蒙古文学的开创、形成时期；1966年至1976年为第二个时期，即十年“文革”时期，文艺倍受摧残破坏，作品遭到禁锢，百花凋零；1977年到1997年为第三个时期，是内蒙古文学发展、繁荣的新时期。

（一）第一时期，是内蒙古文学继往开来，在全区范围内开创新局面，并初步取得成就的时期，同时也是文艺思想斗争较为尖锐、复杂的时期。

1947年至1951年可视为内蒙古文学的开创阶段。自治区成

^① 奎曾：《在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1986年年会上的发言》，载《民族文艺报》，1986年6期。

立之际，正值解放战争和土地改革工作胜利发展时期。建设新文艺，为工农兵服务，已成为我区新的现实和新的时代条件下的一个非常艰巨的任务。为使内蒙古文艺迅速发展，为适应新旧交替、除旧布新的历史转折，中共内蒙古工作委员会遵照中共中央东北局^①党的文艺工作的会议精神，对内蒙古文艺界发出了四点指示：〈1〉执行党的文艺政策，推广新文艺运动；〈2〉培养文艺干部；〈3〉发扬蒙古族的优秀文化；〈4〉创造民族的新文艺。^② 随之，内蒙古文艺运动便蓬勃地发展起来，其显著标志是群众性的革命文艺活动异常活跃，各个地区组织了各类形式的剧团或宣传队，以群众喜闻乐见的戏剧、秧歌、好来宝等民族民间文艺形式，编创或改编各类剧目，广泛宣传，为当时的革命斗争服务，收到了较好的效果。于此同时，在血与火的革命战斗洗礼中诞生成长的一些文学工作者，还创作出诗歌、戏剧、散文及通讯、报告，积极歌颂人民解放战争的伟大力量，歌颂人民群众的顽强精神，表达内蒙古人民对革命胜利的信心。当然，在这些积极配合政治斗争的文艺作品中，也难免有一些粗糙且缺乏艺术性之作。当时一些有识之士，如周戈等提出了文艺作品如何提高艺术质量的问题，并亲自写出了“示范”性剧本：即《黄花鹿》^③ 和《白花蛇》^④。但终因战争与当时现实生活的局限，使这种呼吁变得微弱，甚至有些不合时宜。

1949年，内蒙古自治区同新生的共和国一起进入了一个伟大的新时代。和平安定的生活，人民革命的胜利，为内蒙古文艺的发展提供了可靠的保障，同时，新的现实又对文艺提出了新的要求。因此，在1949年7月全国第一次文代大会后，自治区也于同年11

① 当时内蒙古属中共中央东北局领导。

② 转引自《内蒙古自治区文学史》，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60年。

③ 载《内蒙古日报》，1948年4月24日。

④ 载《内蒙古日报》，1948年5月9、11日。

月,召开了内蒙古文艺工作者第一次代表会议,通过了“内蒙古文学艺术工作者第一次代表会议决议”,^①初步确定了“为农、牧民服务,为经济建设服务”^②的文艺工作方针和任务,并决定成立“内蒙古文联”筹委会。内蒙古文联筹委会成立后,为进一步推动文艺工作的发展,创办了内蒙古地区的第一个文艺刊物《内蒙文艺》。该刊为贯彻党的文艺方针政策,培养青年作家和业余作者,起到了有益的作用。此外,这一时期的《内蒙古日报》(蒙、汉文版)、《内蒙古周报》、《新内蒙古》以及西部绥远地区的《蒙绥日报》、《绥远日报》均辟有文艺园地,登载文艺作品。这些都促进了内蒙古文艺的发展。于此同时,自治区的文艺工作者充分利用文艺园地,怀着对新生活的由衷热爱,迅速地以各种文艺形式反映伟大的历史变革,描绘新的时代生活,塑造新的人物形象。这个时期的文艺作品思想感情大都真挚热情,以普及为艺术准绳,而且惯性地沿袭着以往配合中心任务的习惯。期间,召开的内蒙古民间艺人代表会议,举办的民间艺人训练班,以及改编的大批传统剧和排练的新剧目,都为配合当时的政治运动,为积极宣传抗美援朝和镇压反革命运动,发挥了作用,特别是为促使内蒙古文学的民族化、大众化产生了较大影响。本阶段,自治区文艺工作者还曾针对内蒙古地区如何使文艺更具有民族特点问题展开过热烈讨论,从1950年开始,到1951年初达到高潮,许多文艺工作者积极参加了这次讨论,《内蒙古日报》、《内蒙文艺》连续发表争论文章,《内蒙文艺》编辑部还专门召开过座谈会。^③这次讨论的实质是提高文艺工作者

① 见《内蒙文艺》,1950年创刊号。

② 《内蒙古文学艺术工作者第一次代表会议决议》,载《内蒙文艺》,1950年创刊号。

③ 徐英、乌恩托娅:《建国以来内蒙古关于文学的民族性讨论综述》,载《民族文学研究》,1984年3期。

的思想水平，更好地贯彻执行党的文艺路线，为内蒙古各族人民服务。通过讨论，广大文艺工作者认识到内蒙古文学的民族特点的重要性，决心以自己的创作实践，更有力地体现文学的革命性、群众性和民族性。

1952 年始，内蒙古文学的视野逐步拓宽，完成了“摸索”开创的使命，开始走向丰富。一批作家崭露头角，特别是那些在解放战争时期参加革命，从硝烟弥漫的战火中锻炼成长起来的作家，经过实际工作的冶炼，现实生活的滋养，使他们在政治思想、生活积累、创作思想上都能沿着党的正确文艺道路向前迈进。这一时期，他们的创作虽带有些许稚嫩，但他们与生活的各个方面的联系，使之似乎不太费力就把时代行进的脚步声带入创作之中。这些作家，努力以自己熟悉的文学形式，尽心尽意地表现社会主义新人的成长，反映内蒙古的新生活，以鼓舞各族人民建设内蒙古的意志和热情。自治区这一阶段文学创作的发展，为内蒙古文学的繁荣打下了基础，建立有新的时代特征的艺术风格，成为作家们自觉或不自觉的目标，从而使文学作品在艺术上有了明显的进展，开始注重对生活的提炼，笔触从单纯事件描述转向了人物塑造，从单一的表意，走向了对生活酣醉意蕴的刻意探求。

1956 年，社会主义建设高潮掀起，文化建设高潮随之而来。党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在内蒙古得到有力贯彻，文学创作出现了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自治区广大文学工作者积极性空前高涨，他们不但迅速写出作品，还制定了 5 年到 10 年的创作规划，力求以更多、更好的作品来满足内蒙古人民文化生活的需要。一些长期没有发表作品的作者，也在“双百”方针鼓舞下动起笔来，使这一时期文学作品的数量剧增。“农村、牧区人民生活及斗争，仍是广大作者注意描写的题材。工业、林业题材也吸引了作家们，历史题材作品逐渐增加，北洋军阀统治时期、抗日战争、解放

战争等各个历史时期的斗争生活，也在作家笔下有所描绘。”^① 文学形式亦更加多样化。短篇小说、中篇小说逐渐增多，长篇也有尝试；散文更是丰富多采，叙事、抒情、写景、议论各具特色；杂文小品和革命回忆录也始于此时；诗歌方面，格律诗、民歌体、自由诗都为作者所运用，特别是抒情诗的增多，长篇叙事诗和政治讽刺诗的出现，极大地丰富了当时的自治区诗坛；戏剧创作也开始活跃，出现了大量的话剧和利用二人台、二人转、京剧、晋剧及其它地方戏剧形式创作的新剧目。

这一时期的内蒙古文坛，不仅在体裁上有了新的拓展，出现了一大批博得读者欢迎的优秀作品，而且在诸多方面有着明显的突破。这首先表现在题材上打破了禁区，初步扭转了创作上内容单一化的局面，出现了多样化的发展趋向。其次是在创作倾向上，打破了只准歌颂，不许暴露的樊篱，摆脱了“回避矛盾”、“粉饰生活”，以及由此而来的“无冲突论”影响，开始从多角度、多侧面、多层次上触及人们普遍关心的现实矛盾和社会问题，出现了如《马端的堕落》（张涵）、《包头俩兄妹》（沙痕）、《角落》（杨平）、《钉在沙发上的人》（安谧）、《忙忙碌碌的社主任》（斯仁维扎布）、《村边》（陈清漳）等具有勇于“干预生活”的作品。而且不少文艺工作者，联系实际，努力摆脱教条主义束缚，针对自治区文艺批评和理论方面的问题，提出了许多有益的见解，对创作中的歌颂与暴露问题，公式化概念化倾向，以及文艺组织工作中的教条主义、主观主义都提出了批评，表现出勇敢的探索精神，给文坛带来了勃勃生机。这些新的文学现象，不仅在一定程度上纠正了过去创作领域里那种脱离现实、粉饰生活的不良倾向，而且标志着现实主义在加强、在深化。

“双百”方针还促进了自治区文学翻译工作和理论批评工作的

^① 丁正彬：《内蒙古自治区文学的发展历程》，载《内蒙古大学学报》（哲社版），1984年1期。

开展。《花的原野》曾开辟“春雨”专栏，发表汉文作品的蒙文译稿，赵树理、高玉宝、杨朔、陆柱国、李准等著名作家的代表作被译成蒙古文，还有一些兄弟民族作家作品以及苏联、捷克、匈牙利、蒙古等国的优秀文艺作品亦被转译成蒙文发表或出版。此外，有许多蒙文作品被译为汉文推向全国。同时，学术研究和讨论的风气也有所增浓，曾在报刊上展开了文学的典型问题、社会主义现实主义问题、生活真实和艺术真实问题、戏曲发展方向问题及一些作品的评价问题的讨论。这一切，都是自治区贯彻“双百”方针工作中的有效成果。

然而，1957年反右斗争的扩大化，使自治区文艺界刚刚形成的生动活泼的局面，受到严重挫伤。其主要危害是，混淆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把许多同志（如周戈、尹瘦石、鹏飞、张涵、沙痕、杨平、朱戈、钦达木尼、色道尔吉等）当作敌人，伤害了一大批文艺工作者，使一些有才华、有作为、勇于探索的文艺工作者长期含冤受屈，无法在艺术上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大大影响了自治区艺术的生产力。据统计，“内蒙古文艺界从1957年10月17日开始，连续进行58次会议，集中对周戈等文艺界右派分子进行了斗争和批判。”^① 同时，在对那些被打成所谓“毒草”的文学作品和文艺论著的批判中，由于把认识问题或学术问题当作政治问题对待，把“香花”判为“毒草”，不可避免地出现了不实事求是的粗暴作风和简单化、庸俗化的倾向。此后又加上1958年“大跃进”浮夸风的影响，一些作家则过于拘囿于配合中心工作，赶任务，仓促成篇，致使文艺创作在对人民内部矛盾的反映上退却了，产生了一批无冲突、无差别、粉饰生活的作品，甚至使许多作品流于粗疏、平庸及图解政策，缺乏感人的艺术力量。值得一提的是，由于文艺自身的特殊规律的作用，长篇小说此时获得空前繁荣，出现了自治区成立后的第

^① 转引自《内蒙古自治区文学史》，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60年。

一次创作高潮。

60年代初，内蒙古文艺界也和全国一样，在调整文艺政策工作中，对一些不应受到批判而错批的作品予以恢复名誉，让作家发表意见，切实改进工作。经过一系列的细致艰巨的工作，自治区文学创作和学术空气又一度活跃起来。内蒙古自治区文学艺术工作者第二次代表大会也于此时召开，确定了“更好地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的方针。一些文艺工作者积极响应，泼墨挥毫，写出了一批具有鲜明民族特点的作品和文艺评论，提出作家应不断丰富创作题材，“不仅仅要关心自己阶级的命运，也应关心社会上‘一切人、一切阶级、一切群众’的生活和状况。”^① 在生活表现上，也不能只拘泥于重大事件，要学会“从日常生活中清滤出有份量的素质”，“通过活生生的人物形象，瑰丽多彩的现实画面，来帮助人们认识世界的多样性，历史的规律性和生活的复杂性。”^② 同时，也意识到艺术形式和艺术风格的百花齐放的不可忽视，认为“用讽刺和幽默的笔法反映人民内部矛盾，不但恰当，而且十分需要。”^③ 于此同时，第二次展开了内蒙古文学的地区特点和民族特点的讨论。从1962年纪念《讲话》发表20周年到1963年，《内蒙古日报》、《草原》、《花的原野》等报刊上均发表文章，对文学的地区特点和民族特点问题再次进行探讨。这次讨论是10年前内蒙古文学的民族形式问题讨论的继续，所涉及的讨论内容比10年前更为深入丰富，对发扬和继承少数民族的传统，繁荣创作有着不可低估的意义。以上所有努力，都是为了创造一个让作家能发挥才能、营造艺术创作的自由环境、促使文学创作从狭窄单调走向宽广丰富和多样的有力措施。这种努力，在实际上也有一定的效果：短篇小说和

① 齐放：《百花齐放和题材》，载《草原》，1961年11期。

② 韦木：《借一斑略知全豹》，载《草原》，1961年11期。

③ 鲁歌：《让讽刺和幽默小说的花朵盛开》，载《草原》，1961年9、10期。

诗歌在遭受挫伤之后开始恢复活力,一批历史题材的剧作涌现,散文创作出现的再度繁荣和丰收,作家对艺术质量的重视,等等。但是,内蒙古文坛的这种局面与 50 年代中期一样短促,仍未能继续稳定地发展下去。

1962 年“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警示,又把存在于一定范围内的阶级斗争扩大化和绝对化,要求全国文艺工作者“密切注意当前世界文艺思想领域内阶级斗争的形势”,“警惕和坚决防止修正主义思想和一切资产阶级思想在我国文艺界的滋长。”^①内蒙古也确定文艺战线上的战斗任务,认为“内蒙古自治区内的阶级斗争也是很复杂激烈的……革命文艺工作者应该站稳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积极参加这一场阶级斗争,并且要用文艺武器以革命的精神教育广大群众,使我们的革命红旗,代代相传,永不变色。”^②随之而来的是文艺界的批判之风。在这场批判运动中,自治区文艺界也紧跟形势,一些报刊转载了全国性的批判文章,并对反映我区生活的电影《北国江南》(阳翰笙)及区内的小说《不平静的队长》(张志彤)、《西拉沐伦河的浪涛》(齐木德道尔吉)、《路》(玛拉沁夫)、《海琴》(崔鹏)、《一天》(肖平),歌剧《雪中之花》(特·达木林)、诗歌《夜雾水汪汪》(安谧),散文《满眼春色的草原》(玛拉沁夫)等作品相继进行了不同规模的批评和批判。几年间,文艺界受到很大干扰,但由于党的文艺政策调整的深远影响,广大文艺工作者仍执著于现实生活,在曲折中觅生存求发展,特别是围绕革命传统教育、艰苦奋斗的培养革命接班人的主题,产生了一些艺术成就较高的作品。其中,取得显著成就的是革命回忆录、报告文学和戏剧。

^① 《全国文联委员(扩大)会议决议》,载《人民日报》,1963 年 5 月 22 日。

^② 《高举革命红旗永远做革命的文艺工作者》,载《草原》,1964 年 1 期。

据初步估算,戏剧创作仅在 60 年代初,其数量就达千部(篇)左右;老干部纷纷撰写回忆录,颂扬英烈辉煌业迹,使革命回忆录空前丰收;报告文学也在极度的关注中得到繁荣,《草原》、《花的原野》等报刊都辟有专栏,社会主义英雄谱、内蒙古各盟市风貌、前进中的“乌兰牧骑”等专题,内容丰富多彩,且有一定的吸引力。但是,这一时期的创作仍然存在着一个最普遍的问题,那就是作家多专注于重大事件的表现,以题材自身的价值等同于艺术的真实性与审美价值,似乎生活的微波细流不足挂齿,致使自治区的创作题材和主题趋于单一,人物形象与作品的社会功能单一。不久,毛泽东在“两个批示”中对建国以后整个文艺界作了否定后,“左”的文艺思潮进一步膨胀,文艺界面临的形势更加严峻。接着,中国社会生活又被卷入一场更大的政治风暴之中,而且文艺首先受到猛烈冲击,致使自治区文学创作也随之跌入谷底。

(二) 第二期,是十年动乱的反常时期。在内蒙古,1966 年 8 月以后,《草原》、《花的原野》等文艺刊物均被迫停刊,内蒙古文联及其它各种组织被迫停止活动,许多作家被打成“黑帮”、“反党叛国分子”、“民族分裂主义分子”而受到隔离审查或批斗,有的被关押,惨遭迫害。当时的自治区文艺界被诬为“叛国文学和可能存在的叛国集团”,随后,有多名作家被点名批判,许多优秀作品被冠之于“叛国文学”或“毒草”打入冷宫。特别是 60 年代末,在内蒙古自治区开展的“挖肃”和挖“新内人党”^①运动中,曾为内蒙古文学的开创、发展做出卓越贡献的一批作家、诗人,身心遭到严重摧残,甚至被迫害致死。在这种情势下,自治区的文学活动完全丧失了自我调节的功能,文艺创作出现了历史上罕见的大曲折大倒退。直到 1972 年夏,毛泽东提出繁荣文艺创作的要求后,我区随全国开始恢复文艺工作,我区的文艺刊物更名为《内蒙古文艺》于 1973

^① 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在内蒙古制造的两大冤案。